

轅与轮：

语言论争与作家的现代汉语体验

张昭兵 著



学苑出版社

本文选取了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即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到抗战前为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是白话文运动已经完全站稳脚跟，

而白话文内部本来就存在的语言观念的分歧，

因为一种新的语言观念的破土而「内爆」分流的时期；

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主要文体在语言上渐趋成熟，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纷纷创作出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时期。

ISBN 978-7-5077-3644-1



9 787507 736441 >

定价：20.00元

轶与轮：语言论争与作家的 现代汉语体验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轅与轮：语言论争与作家的现代汉语体验/张昭兵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077 - 3644 - 1

I. ①轅… II. ①张…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语言—
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538 号

责任编辑：郑泽英

封面设计：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邮箱：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本尺寸：880 × 1230 1/32

印 张：7.5

字 数：146 千字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自序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论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文学与语言的现代关系问题，二是在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现代汉语写作中，文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现代文学史上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不是文学的发展带出语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语言论争和运动配合着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的零部件而随其运转。恰恰相反，语言是“辕”，文学是“轮”，驾辕的语言决定着文学之轮的方向和快慢，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挥鞭人，统率着驾辕的马。

本文选取了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20世纪20年代下半年到抗战前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是白话文运动已经完全站稳脚跟，而白话文内部本来就存在的语言观念的分歧，因为一种新的语言观念的破土而“内爆”分流时期；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主要文体在语言上渐趋成熟，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纷纷创作出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时期。

上编重点考察这一时期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围绕“大众语”问题的语言论争以及各种语言观念的交锋；下编根据作家是否有语言的自觉，以及考虑到文体的平衡，选取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沈从文，考察他们个体写作的语言体验、语言观念和语言想象。

需要说明的是，对鲁迅的选择是忽略了文体因素的，因为鲁迅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是逸出了文体界线的，本文是在考察作家写作的多种语言可能性的出发点上选择了鲁迅。其他三位作家周作人、闻一多和沈从文分别算是散文、诗歌和小说写作的代表。具体来讲，对鲁迅的研究着重于他的语言体验，对周作人和闻一多的研究着重于他们的语言观念，对沈从文的研究则着重于他的语言想象。当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不可能这么泾渭分明，语言体验、语言观念和语言想象交叉论述的情况时有发生。全文的重心在下编，上编是它的语言运动背景和语言理论基础。目的就在于，试图在对这一时段大的语言运动潮流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重点透视作家个体“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各自独特的心路历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是自己与自己的交谈，是鲁迅在沉静中由外部社会现实走向内部心灵现实的语言历险。一路上与他为伴的只有语言，也只能是语言。他与自己交谈，同时与语言交谈；他通过与语言的交谈确认自己的存在，通过与自己交谈走向语言。对于周作人的讨论，以《看云集》中心，是因为这个集子在周作人整个语言观念的流变中处在一个枢纽的位置，从它入手可以带出周作人前前后后的语言思考和语言观念的脉络。《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也是他“格律诗”创作理念的实践之作，围绕《死水》的语言讨论也比较多，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对现代汉语从草创期到逐渐成熟的考察。沈从文是一个多产作家，而《边城》是他在文体上最成熟、语言想象也最空灵的作品，主要表现为“及物”与“离物”

的融合；得意不忘言；直而幽、白而雅、诗而真。

通过对这一时段公共空间的语言论争和作家个体现代汉语体验的考察，呈现一个时期大体的语言面貌，并勾勒出它与上下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剖面展示现代汉语发展的年轮，以及作家与现代汉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个语言切入的视角和维度，将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上升到一体两面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打破传统语言工具论的拘囿而“在汉语中理解汉语”。

有人说“表演艺术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想文学研究也是，具体到文学语言研究来说则尤其是。因为语言本身似乎是排斥研究的，我们自己就存在于语言之中，想跳出语言之外观照它、研究它，实在有点鲁迅先生所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的滑稽。聊以自慰的是，文学语言研究注定是不完美的，研究者所能做的最现实的工作恐怕还是与作家一道上路，走“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目 录

自序	1
引言 现代文学史叙述的语言之维	1
上编：“内爆”与“分流”：公共空间 的语言论争、语言观念	
第一章 文学语言的“二次革命”	
——从文白之战到中欧之争	23
第一节 一份语言文献	23
第二节 大众语和方言	32
第三节 大众语和欧化语	42
第二章 回到语言现场和拿语言说事	
——语言观念分析	54
第一节 关于“语言”与“话语”的一点 理论认识	54
第二节 工具论·工具化的本体论·本体论	65
第三节 音本位·字本位·词本位	81

下编：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个体写作 的语言体验、语言想象

第三章 犹在所说与所欲说之间	
——鲁迅《野草》的语言体验	97
第一节 《野草》的几个疑问和语言困境	97
第二节 独自到语言的刺丛里走一走	104
第四章 两个鬼的语言	
——以《看云集》为中心考察周作人 语言观念的流变	122
第一节 《看云集》：周作人的语言堤坝	122
第二节 自“五四”到抗战	129
第五章 白话诗的救赎：戴着语言的镣铐跳舞	
——闻一多《死水》的语言自律	144
第一节 《死水》的前前后后	144
第二节 融古·化西·格律	156
第六章 没有语法的生活	
——沈从文《边城》的语言地籁	170
第一节 “及物”与“离物”	177
第二节 得意不忘言	186
第三节 直幽·白雅·诗真	197
结论 文学之“轮”与语言之“辘”	
——文学与语言之现代关系小结	211
附录 主要参考书（篇）目	218
后记	229

引言 现代文学史叙述的语言之维

惯常的文学史叙述，主要有两个维度，或为政治的维度，或为思想的维度；前者可称为政治史的文学史，后者可称为思想史的文学史；前者的代表当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后者最突出的例子应为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王著文学史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政治化的，但具体到作家作品的论述上，又尽可能地尊重历史事实，呈现历史面貌的多样性，从而突破了既定的政治框架，造成了政治标准与历史原貌的矛盾纠葛。虽然王瑶试图尽可能地调和这种矛盾，比如以“鲁迅的方向”淡化甚至代替一般政治性的革命的标准，但还是遭到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向指责，里外不讨好。体制内的人指责他的政治性贯彻得不彻底，体制外的人指责他受政治的制约放不开手脚，没有将文学史的原貌呈现出来。时至今日，如果说王著文学史还依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话，恰恰正在于它对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史实的兼顾上。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

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上来说，就是一

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①。

也就是说，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是外在于文学的东西，它就是文学本身的组织和肌理。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离开政治和意识形态去谈文学的话，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是断章取义就是痴人说梦。因为政治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组织体制、权力角逐，更是一种现实生活——政治生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物质形式。

王著文学史的尴尬在于，他先是将政治与文学分开，然后在跨度极大的两极之间做调和而有点力不从心，这从王著文学史上、下册的变化和不平衡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出来：

写作下册时，王瑶的心态已不像写上册时那样舒展，当初那种力图以史家的个性风格去整合历史的想象力收敛了。如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该书的上册比较精练，也更有才情与卓识，下册则较冗繁拘谨，篇幅比例失调，有些评述放宽了“入史”的标准。^②

后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注重文学和社

^① [英]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1版，第27页。

^②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第77页。

会政治环境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做是王著文学史的承续，但洪著的叙述显得较为从容割切，原因是洪著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了一个连通的媒介，即文学体制，紧紧抓住文学体制展开叙述，就可以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因此不妨将洪著文学史称之为体制史的文学史。

钱理群等著文学史（简称钱著）既是对王著文学史思想维度的强化，又是对王著文学史政治栅栏的拆除，钱著甚至把思想的维度提升到整个文学史的总体框架结构的高度。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合写的名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这一文学史写作的理论纲领。该文称：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①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原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此据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1版，第1页。

连用五个“进程”形成一种排山倒海之势，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知识分子“重回五四”启蒙思潮在文学史写作上的兴奋激扬。该文进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构想，即：

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①。

其中“改造民族的灵魂”应是这一文学史观的核心内容，走向“世界文学”是它的诱因，“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和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是它的表现形式，它呼应的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启蒙思想。

早在1922年，胡适发表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通过“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②，彰显了欲以“进化论”思想梳理文学史的意图，后来所著《白话文学史》即是对这一意图的落实。梁实秋在几年后的1926年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原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此据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1版，第2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文，表现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文学史观，他是以“人性”作为考察和评判的中心，也就是说：

先决定一个符合纯正“人性”的“共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然后评判各时代个别的文学距这“中心”的远近，凡距离较远者便是第二流第三流的文学，最下乘的是和中心背道而驰的。因此，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和方法不再是叙述文学一代一代“进步的历程”，而在品味确定各时代不同的文学距离纯正的“人性”中心的远近程度。^①

这样，梁实秋就把胡适带箭头的线性文学史叙述构想，压缩铺排为空间维度上的圈层结构。胡适的“进化论”和梁实秋的“人性观”都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借用，更晚些时候，周作人于1932年将在北平辅仁大学所做的八次演讲结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则是借用中国传统的“载道”与“言志”的思想，意欲为新文学叙述寻求思想依托。无论是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史观，还是周作人的“载道”、“言志”文学史观；无论是借用西方的现代思想，还是承续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写出的文学史，都不免有“思想先行”的嫌疑，这种“思想先行”的文学史叙述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简单化，要么演进的线条太单

^①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第9页

薄，“不能细致而充分地说明文学史上某些看似偶然的不合演进‘规律’的现象”^①，比如胡适的文学史观；要么因失去时间维度而使得文学史叙述成为主观臆想而无法真正实施，比如梁实秋的文学史观；要么陷入两种思想的历史循环之中而无法呈现未来文学发展的细节和新质，比如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对此，钱钟书有讽刺性的批评，他说：

我们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诤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②

^①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第9页。

^②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6月1版，第3-5页。

新时期以来，钱著文学史率先重振了“五四”先贤思想史写作的路径，后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依然是在思想史框架内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即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析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以“精神史”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线，因此不妨称之为精神史的文学史。所不同的是，董编以抽象的“五四”精神为网、为旗，重新打捞、召集一度被遮蔽的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的作家作品，但“以主观设立的标准来选择和评判作家作品，必然无视眼前的事实，从而造成对作家创作历程人为地割裂和作家（包括学者）精神谱系人为的混淆与遮蔽”。^①陈编则是“以作品为主型”，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的教学传递出文学史的信息”，“注重从作品内部发掘由作家心灵所开辟的精神意识演变线索”。^②特别是揭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即精英（庙堂）和先锋意识，抗战以后被去蔽的民间意识，因为抗战和长期激烈的国内外政治与军事对峙并渊源于传统兵法哲学而产生的战争文化心理”^③等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问题是：

① 部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见《小批判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1版，第232页。

② 部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见《小批判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1版，第237页。

③ 部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见《小批判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1版，第234页。

抽去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或竹内好在分析鲁迅时所说的文学与政治的“对决”，陈编紧紧抓住的“精英启蒙意识”、“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潜隐结构”和民间理想主义就难以充分见出作家个体的精神立场，也难以充分暴露李杨先生所分析的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的共谋。^①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思想价值评判；无论是文学体制变迁，还是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勾连，都是文学本身的应有之义。它们都是现当代文学内部有机的组织成分，它们之间相互的碰撞、磨合、纠缠、排挤，共同塑造着作家个体的精神特性和群体的精神谱系。单独拎出任何一个方面作为文学史叙述高高在上的结构或价值维度，都会造成文学史内部有机成分的缺失而不可能呈现文学史的本真形貌。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史研究的空间得到极大的开拓，曾一度出现了文学报刊研究的热潮，原来政治史的、思想史的文学史框架出现了裂缝，围绕文学报刊的人事纷争挤了进来，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学史细节浮出水面。吴福辉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是这一文学史叙述空间开拓的集大成者。吴著文学史或许将成为一种标志，它标志着文学史叙述把本就属

^① 部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见《小批判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1版，第235页。